

政策不确定与审计师选择

——基于省委书记更替的经验证据

步丹璐¹,石翔燕¹,张晨宇²

(1. 西南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0;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国际商学院,北京 100029)

[摘要]考察省委书记更替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省委书记更替时,事务所会提高审计质量,倾向于委派经验更丰富的审计师,尤其是拥有合伙人身份和执业经验丰富的审计师。省委书记更替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低市场化进程以及高盈余操纵的公司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事务所更可能对省级国有企业委派经验丰富的审计师,尤其是第一顺位的签字审计师。

[关键词]政策不确定性;审计师选择;官员更替;审计风险;审计质量;审计意见;审计费用

[中图分类号]F239.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4833(2018)02-0039-11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上的集权以及经济上的分权促使地方官员致力于辖区经济的发展,将GDP增长率作为经济建设的首要任务。“中国特色联邦主义”“晋升锦标赛”分别从财政分权和政治晋升的角度解释了中国经济增长奇迹^[1-2]。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对官员的考核指标转变为经济绩效指标,各地官员从此围绕GDP增长展开了“政治晋升锦标赛”,并且,中央为了减少考核误差、增加激励效果,会运用相对绩效的评估方法来决定官员升迁^[2]。这无疑加剧了官员与前任官员以及同级官员之间的“纵向竞争”和“横向竞争”,进一步强化、激励了地方官员为获得政治晋升而展开经济竞赛^[3]。作为政府权力代表的官员,拥有法定的政治权力和制定经济政策的权力,并掌握了经济发展关键性的资源,因此可以对当地经济的发展实施有效的控制。随着我国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可能发生因任期、交流、退休或其他政治原因而导致地方主政官员更替,官员更替的现象已成为一种常态^[4]。例如,在十九大闭幕后,广东、福建、河北、辽宁、上海、江苏、陕西七省市省级党委书记先后进行了调整。由于官员特征的异质性,从而导致官员之间的行为差异,官员更替时,新任官员会实施新的经济政策。同时,官员更替意味着现有的政治格局被打破,资源将重新配置,社会网络也将重新构建,从而给辖区内的企业带来一定程度上的不确定性。政府环境是企业面临的关键的外部环境,而官员更替会导致企业所面临的政府环境发生改变,进而影响地区宏观经济发展和微观企业行为决策。

宏观层面上,官员更替会显著影响地区的宏观经济增长、抑制腐败程度以及FDI区位选择^[4-6]。微观层面上,官员更替会影响企业的投资水平、慈善捐赠、寻租支出、盈余管理等^[7-12]。由于官员变更

[收稿日期]2017-03-24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6XJA630001)

[作者简介]步丹璐(1978—),女,江苏镇江人,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会计信息与公司治理研究;石翔燕(1992—),女,山东临沂人,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会计信息与公司治理研究;张晨宇(1989—),男,河南商丘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会计信息与公司治理研究。

意味着微观企业的经营环境发生变化,被审计单位环境不确定性加大,将导致事务所审计风险增加,因此,从审计师选择的角度考察宏观政治环境变动对微观审计行为的影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对于依赖政治环境的中国企业而言,官员更替传递出政策不确定的风险信息,对企业的经营环境和企业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这将增加事务所审计工作难度、审计时间和审计风险。目前,越来越多的审计师通过政治身份建立了一定的政治联系,如当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府顾问等^①。政治联系作为审计市场的稀缺资源,审计师在执业过程中十分珍惜这种稀缺资源^[13]。因而,审计师的审计风险会在省委书记发生更替时显著增加。官员更替时,为了应对审计工作难度和审计风险的增加,维护良好的职业形象以维持或建立新的政治联系,事务所会投入更多的资源,如更换更有经验的审计师以提高审计质量。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在官员发生更替时,事务所是否会通过审计师选择来降低审计风险?具体而言,我们首先回答省委书记变更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以及这一影响是否因企业性质不同、制度环境差异而有所不同。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到了由大变强的关键时期,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不再简单追求经济发展的速度。十九大报告未提及今后中国 GDP 翻番等目标,这意味着今后对官员的考核将不再“唯 GDP 论”。十九大首次提出“政治领导力”,强调党的“政治建设”,选人用人强调“政治标准”。因此,十九大后,中央将会建立针对地方官员的综合考核指标,同时考虑官员政治绩效和经济绩效,更加关注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更加关注民生、环保等问题。我国官员任期制以及干部交流制度引发地方官员更替。基于官员更替这一具有“准自然实验”性质的冲击事件,可以更加明确地考察宏观政治环境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同时对于我国目前的官员治理、考核体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可能的贡献是:第一,本文利用政府官员更替这一外生事件,从审计师选择的角度为宏观政治变动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拓展了宏观政治变动对微观企业行为影响的研究,丰富和补充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文献。第二,本文从产权、制度环境等不同视角考察了官员更替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在扩展研究思路的同时,更有利于我们理解影响企业行为的制度环境因素。

二、文献综述、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 文献综述

独立审计通过对上市公司披露的财务报告进行鉴定,可以有效地缓解企业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减轻代理问题,因此,审计具有公司治理的作用,可以有效缓解代理冲突。在委托代理问题严重的企业,信息不对称问题严重,这类企业可能更倾向于选择高质量的审计师对其进行审计。相关的研究分别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控股股东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程度以及大股东资金占用的角度研究公司治理与审计师选择之间的关系^[14-16]。研究发现,企业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高质量审计师之间是一种倒 U 型的关系,并且控股股东的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偏离程度越高,公司越倾向于选择国际四大;大股东对公司资源占用越多,公司越有可能聘请高质量的审计师,而聘请高质量的审计师能够有效降低控制性股东的资金侵占^[14-16],减缓代理冲突,这说明高质量的外部审计具有一定的治理功能。国有股东不仅要创造企业价值,还承担很多社会责任目标,如稳定社会秩序、增加社会就业等。当社会责任目标与公司价值最大化目标发生冲突时,就可能会出现国有股东侵占上市公司资源的现象。因此,国有企业可能更不愿意聘请高质量审计师进行财务报告的审计工作,更有可能倾向于选择“本地小所”,具有“地缘偏好”性^[17]。企业选择四大审计师的可能性会随着国有股权的减少而增加,随着外资股权的提高而增加^[18],而聘请高质量的审计师也能帮助企业有效吸引外资^[19]。国际化的董事具有较强的监督意愿和治理能力,董事会国际化与高质量审计显著正相关,且

^①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统计,截至 2015 年 8 月,注册会计师行业从业人员担任全国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代表共计 835 人次,较 2011 年底增加 448 人次,增幅 115.8%;其中,担任省级以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代表共计 88 人次,较 2011 年底增加 47 人次,增幅 114.6%。

外籍独立董事的影响更大^[20],拥有海外背景独立董事的公司更有可能聘请大型事务所^[21]。还有很多文献研究政治联系与审计师选择的关系,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具有政治联系的公司倾向于选择低水平的审计师,选择“四大”的可能性低^[22];而一些学者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实际控制人具有政治身份,是一种政治资源,提升了企业的审计需求,更倾向于选择大所^[23-24]。实际控制人变更会对审计师选择产生重要影响,相关研究发现企业发生控制人变更会导致事务所也发生变更,并且当实际控制人性质由非国有控制人性质变更为国有控制人性质时,企业对会计师事务所的选择会倾向于由高质量事务所变更为低质量所^[25-26]。上述文献鲜有涉及政治环境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本文试图从省级官员更替的视角,考察省委书记更替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风险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在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下,地方官员掌握着经济发展的控制权,能够推动地方经济体制改革,制定相关的经济发展政策;以GDP增长为主的政绩考核激励了地方官员“为增长而竞争”的格局。而地方官员变更将会导致当地政府人事结构调整和经济政策变动,政府环境是企业面临的关键外部环境,官员更替导致政治环境发生改变,企业会针对政治环境的改变而做出应对策略。

一方面,官员更替使政府相关政策缺乏长期性和稳定性,导致政策上的不确定性,对企业经营环境产生一定冲击。官员的年龄、性格、性别等个体特征存在差异,新上任的官员有不同的发展规划,因此会改变当地原有的产业政策和财税政策等,与上届政府的政策产生明显差异^[27]。在“新官上任三把火”及“政治升迁”的激励下,新任官员在任职初期会积极开展当地经济建设,进行大规模的规划活动,以期快速提高当地的经济水平。因此,新任官员会积极制定有利于自身政治升迁的发展规划,进而使得原有的经济发展规划和经济政策很难延续甚至会被中断,这增加了官员在发生更替年份的政策不确定性^[4]。官员发生更替时会导致政策的不确定性,使企业面临的外部不确定性增加,企业的经营风险增加,进而增加了事务所的审计风险。

另一方面,政府领导的人事结构调整和政治权力结构变化刷新了当地原有的政企、政商关系网络。因此,地方官员的更替意味着现有的政治联系将重新洗牌,企业可能保持谨慎,通过减少投资支出、减少现金股利支付和增加现金持有量等方式来应对风险^[8-9,28-29]。同时,企业可能会通过增加慈善捐赠、寻租支出主动地谋求政治联系^[10-11],以应对官员更替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风险。当地方官员发生更替时,会使企业高管发生非正常变更,从而建立新的政企联盟^[30]。在官员更替的政策不确定性年份,企业会提高盈余管理程度、降低信息披露质量,企业信息透明度降低,审计师获得信息的难度加大,信息不对称程度明显加深^[12,31]。官员发生更替时,会改变企业行为,促使企业活动更加复杂,加大了事务所的工作量和审计投入,增加了审计风险。

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审计师具有规避风险的强烈动机。在面临官员更替时,审计师作为会计信息活动的鉴证者,需要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工作能力,才能在复杂的审计业务活动中鉴别企业会计活动的真伪^[32]。在经营活动较为复杂的政策不确定性年份,为应对企业的风险业务,事务所会委派经验更为丰富的审计师。而且,政治联系在审计市场是一种十分珍贵稀缺的资源,拥有政治联系的事务所享有较高的声誉,会给事务所带来超额溢价^[13]。在官员更替时,事务所为了维护良好的职业形象以维持或建立新的政治联系,会投入更多的资源,如更换更有经验的审计师以提高审计质量。因此,基于以上理论分析,官员更替可能会带来政策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政策的改变和原有政企关系的重新洗牌,改变了企业行为,增加了企业经济活动的复杂性,致使审计风险增加;同时,事务所对于政治冲击的敏感性感知,会使事务所委派经验更丰富的审计师以应对审计风险的增加。基于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说1。

假说1:政策不确定时,事务所会提高审计质量,倾向于委派经验更丰富的审计师。

由于终极控制人性质的不同,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中政府干预和影响的程度也会不同。中国国有企业的高管一般由组织部门委派任命,具有行政级别,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政府可以通过影响国有企业高管的任免以及直接的行政干预,进而对国有企业实施有效地控制和影响。研究发现,国有企

业高管任职的连续性会受到地方权力变动的影响,地方主政官员的更替会导致国有企业高管发生非正常的变更^[30]。并且,在政企关系重建的过程中,新上任的官员基于追求政治目标的目的,会主动与国有企业建立利益联盟,将财政收入、税收、就业等目标强加于国有企业,干预国有企业投资决策,增加了国有企业的政治成本^[31]。因此,国有企业在官员更替时面临的风险更高,政策不确定性风险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国有企业。为了应对国有企业复杂的审计业务活动,事务所会委派经验更为丰富的审计师。基于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说2。

假说2: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在政策不确定时,事务所会提高审计质量,倾向于委派经验更丰富的审计师。

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制度环境可能会因为资源禀赋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在不同的制度环境和经济发展地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是不同的,政府对市场的参与力度和资源配置的方式在不同地区也会有所差异。在市场化进程低的地区,政府掌握的权力大,企业更有可能通过政府而不是通过市场获取资源。因此,在市场化进程低的地区,政府对市场的替代作用显著,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市场化进程水平低的地区,其相应的法律制度和金融市场不完善,并且政府的干预普遍存在,企业更倾向寻求建立政治关联作为一种替代性的保护机制,并且倾向于选择低质量的审计师^[33]。在低市场化进程地区,官员更替使得原有的政治联系被打破,企业原有的优势将不复存在。而在高市场化进程地区,政府可能尊重市场规律和遵守市场规则,政府主要的职能就是提供公平有效的治理环境,高市场化进程地区的企业更有可能以市场化为原则参与市场竞争,因而减少了政府参与市场资源配置的行为。因此,在低市场化进程地区,地方官员对企业影响较大,官员更替带来的不确定风险的影响也更大,对审计风险的影响更显著。基于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说3。

假说3:相对于高市场化进程地区,低市场化进程地区在政策不确定时,事务所会提高审计质量,倾向于委派经验更丰富的审计师。

盈余管理会侵蚀企业财务报告质量,增加公司的错报风险。因此,高盈余操纵的企业财务报告质量更低,审计师的审计风险更大。政府虽然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但却会通过各种政策优惠的方式与企业建立联系。中央对地方官员的考核依据主要是经济指标,当地企业经营业绩的好坏关系到地方官员的政治绩效。辖区内企业的经营业绩越好,地方官员的绩效考核越好,政治晋升的可能性越大。地方官员会给予当地企业税收优惠、政府补助,以此促进企业的发展。企业或通过向上的盈余管理向市场传递关于经营业绩、公司价值的积极信号,吸引政府的注意,与政府建立联系,获得政府政策的支持;或通过向下的盈余管理,做低企业的利润,获得政府补助,并且向下进行盈余管理的幅度越大,获得政府补助的金额越大^[34]。当官员更替时,企业面临政策不确定,为了规避可能的风险,企业会进行盈余操纵,提高盈余管理程度,降低信息披露质量^[12,31],加剧企业和事务所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这将会增加审计师工作难度和审计风险。当官员更替时,高盈余操纵的企业信息质量低,审计风险大,事务所对于这类企业做出更积极的反应。基于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说4。

假说4:相对于低盈余操纵企业,高盈余操纵企业在政策不确定时,事务所会提高审计质量,倾向于委派经验更丰富的审计师。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3—2011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研究样本,并按照以下方式进行选择:首先,剔除金融行业上市公司的样本;其次,剔除了ST、PT公司样本;最后,将主要研究变量缺失的样本也予以剔除;经过一系列的筛选,我们最终得到18767个有效的上市公司样本。

本文注册会计师数据是通过手工搜集整理所得,数据来源于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网站;我们通过百度、搜狐、谷歌等搜索引擎以及人民网、新华网等手工搜集了各省省委书记的数据;市场化进程指数来自樊纲等

编写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除了企业最终实际控制人数据来自 WIND 数据库外,本文其余财务数据均来自 CSMAR 数据库。同时,本文对连续变量进行上下 1% 的缩尾处理,以此消除数据极端值的影响。

(二) 变量定义与模型设定

我们构建如下模型来验证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说:

$$Experience_{i,t} = \alpha + \beta_1 \times Policy\ Uncertainty_t + Controls + \varepsilon \quad (1)$$

1. 被解释变量: 审计师经验 *Experience*

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选择审计师是否为事务所合伙人、教育背景和自获得注册会计师证书以来的执业时间三个维度来度量审计师经验。审计师是否为事务所合伙人代表审计师地位的重要性,相对于非合伙人审计师,拥有合伙人身份的审计师经验更丰富,当审计师为事务所合伙人 *Partner* 时取值 1, 否则为 0。教育背景代表审计师的受教育程度,高教育背景的审计师理论水平相对更高,能够应对复杂的审计业务,当审计师教育背景 *Education* 为硕士或博士时取值 1, 否则为 0。执业时间代表审计师的行业经验,审计师执业时间越长,行业经验越丰富,越能够把握审计风险,当审计师执业时间 *Practice Time* 高于行业均值时取值为 1, 否则为 0。将上述三个维度指标叠加构成审计师经验的综合指标: $Experience = Partner + Education + Practice\ Time$ 。 *Experience* 值越大,代表审计师经验越丰富。由于 *Experience* 分别取值 0、1、2、3, 因此我们采用 *order probit* 模型回归分析。

2. 解释变量: 政策不确定性 *Policy Uncertainty*

在省级层面,省委书记掌握了控制当地政治、经济发展的权力,并对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负责。因而,省委书记是本省党政领导的“一把手”。当省委书记发生更替时,必然会改变当地的政治生态环境,使当地的政策发生改变。基于此,本文政策不确定性取自省委书记发生更替的年份。当省委书记更替时, $PU(Policy\ Uncertainty) = 1$, 否则为 0。同时,参考相关文献,若在 1—6 月份发生省委书记变更,将本年定义为政策不确定性年份;7—12 月份发生省委书记更替,则将下一年定义为政策不确定性年份^[27]。

3. 控制变量

为减少其他因素带来的偏差,我们控制以下变量:市场化进程指数 *Marketization Index*,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程度越高,市场化进程越低,法律保护环境越弱,政府治理质量越差。盈余操纵 *EM*,采用修正的 Jones 模型计算得到,盈余管理大于中位数时 *EM* 取值为 1, 否则为 0。公司规模 *Size*,为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应收账款 *Receivable*,为公司应收账款净额与总资产之比;存货 *Inv*,为公司存货与总资产之比,这三个指标用来衡量公司审计业务复杂度。总资产报酬率 *Roa*,为净利润与总资产之比;经营现金流量营收比 *Roc*,为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与营业收入之比,这两个指标衡量公司盈利能力。是否亏损 *Loss*,若公司本年度发生亏损则取 1, 否则为 0。成长性 *Growth*,为公司销售收入增长率。财务杠杆 *Lev* 等于公司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之比;流动比率 *Crr* 等于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之比,这两个指标用来衡量公司面临的财务风险大小。企业产权性质 *SOE*,国有企业性质取值为 1, 否则为 0。是否为四大审计 *Big4*,若公司由国际四大审计,取值为 1, 否则为 0。审计意见 *OP*,当年年报为标准审计意见,取值为 1, 否则为 0。审计报告时滞性 *Audit_lag*,为每年 12 月 31 日至审计报告日的时间间隔,取自然对数。本文将企业所有的变量滞后一期来减少内生性带来的计量偏差。本文的回归模型还增加了行业和时间虚拟变量来控制行业效应和时间效应。变量定义如表 1 所示。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表 2 报告了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及差异性检验结果。由 Panel A 可知,审计师经验的均值为 0.998。样本期间,24.2% 的上市公司面临着省委书记更替。公司规模的自然对数为 21.376,财务杠杆为 0.529,应收账款约占总资产的 11%,存货约占总资产的 17%。公司流动比率均值为 1.518,总资产回报率为 2.5%,经营现金流量营收比为 8.9%。约 12.3% 的样本公司发生亏损,销售收入增长

步丹璐,等:政策不确定与审计师选择

率为 24.7%。约 64.7% 的样本公司为国有企业;约 5.8% 的公司聘请了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约 92.2% 的公司审计意见为标准审计意见,审计报告时滞性为 4.720。

表 1 主要变量定义

| 名称 | 符号 | 定义 |
|-----------|----------------------------|---|
| 审计师经验 | <i>Experience</i> | 我们选择审计师是否为事务所合伙人、教育背景和自获得注册会计师证书以来的执业时间三个维度来度量。审计师是否为事务所合伙人代表审计师地位的重要性,相对于非合伙人审计师,拥有合伙人身份的审计师经验更丰富,当审计师为事务所合伙人 <i>Partner</i> 时取值 1,否则为 0。教育背景代表审计师的教育程度,高教育背景的审计师理论水平相对较高,能够应对复杂的审计业务,当审计师教育背景 <i>Education</i> 为硕士或博士时取值 1,否则为 0。执业时间代表审计师的行业经验,审计师执业时间越长,行业经验越丰富,越能够把握审计风险,当审计师执业时间 <i>Practice Time</i> 高于行业均值时取值为 1,否则为 0。将上述三个维度指标叠加构成审计师经验的综合指标: $Experience = Partner + Education + Practice Time$, <i>Experience</i> 值越大,代表审计师经验越丰富 |
| 政策不确定性 | <i>Policy Uncertainty</i> | 当省委书记更替时, $PU(Policy\ Uncertainty) = 1$,否则为 0。若在 1-6 月份发生省委书记变更,将本年定义为政策不确定性年份;7-12 月份发生省委书记更替,则将下一年定义为政策不确定性年份 |
| 市场化进程指数 | <i>Marketization Index</i> | 参照樊纲等编写的我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指数来衡量 |
| 盈余操纵 | <i>EM</i> | 采用修正的 Jones 模型计算得到,盈余管理大于中位数时 <i>EM</i> 取值为 1,否则为 0 |
| 公司规模 | <i>Size</i> | 总资产取自然对数 |
| 财务杠杆 | <i>Lev</i> | 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之比 |
| 总资产报酬率 | <i>Roa</i> | 为净利润与总资产之比 |
| 成长性 | <i>Growth</i> | 销售收入增长率,即(本年度销售收入-上年度销售收入)/上年度销售收入 |
| 应收账款 | <i>Receivable</i> | 应收账款/总资产 |
| 流动比率 | <i>Crr</i> | 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
| 经营现金流量营收比 | <i>Roc</i> |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营业收入 |
| 存货 | <i>Inv</i> | 存货/总资产 |
| 报告时滞性 | <i>Audit_lag</i> | 每年 12 月 31 日至审计报告日的时间间隔,取自然对数 |
| 是否亏损 | <i>Loss</i> | 若公司本年度发生亏损则取 1,否则为 0 |
| 国有企业 | <i>SOE</i> | 若最终控制人为地方政府部门取值 1,否则为 0 |
| 是否四大审计 | <i>Big4</i> | 若公司由国际四大审计,取值为 1,否则为 0 |
| 审计意见 | <i>OP</i> | 审计意见虚拟变量,标准审计意见时, <i>OP</i> 取值为 1,否则为 0 |
| 行业 | <i>Industry</i> | 行业虚拟变量 |
| 时间 | <i>Year</i> | 时间虚拟变量 |

表 2 描述性统计与单变量差异性检验

| Panel A:主要变量描述性分析 | | | | | | | | |
|-------------------|----------|-------------|-----------|------------|------------|------------|------------|-----------|
| <i>Variable</i> | <i>N</i> | <i>Mean</i> | <i>p5</i> | <i>p25</i> | <i>p50</i> | <i>p75</i> | <i>p95</i> | <i>sd</i> |
| <i>Experience</i> | 18767 | 0.998 | 0 | 0 | 1 | 2 | 2 | 0.856 |
| <i>PU</i> | 18767 | 0.242 | 0 | 0 | 0 | 0 | 1 | 0.428 |
| <i>Size</i> | 18767 | 21.376 | 19.723 | 20.650 | 21.283 | 22.006 | 23.358 | 1.099 |
| <i>Lev</i> | 18767 | 0.529 | 0.179 | 0.370 | 0.512 | 0.643 | 0.855 | 0.275 |
| <i>Roa</i> | 18767 | 0.025 | -0.107 | 0.010 | 0.030 | 0.057 | 0.120 | 0.077 |
| <i>Growth</i> | 18767 | 0.247 | -0.369 | -0.012 | 0.151 | 0.344 | 0.975 | 0.647 |
| <i>Receivable</i> | 18767 | 0.110 | 0.003 | 0.032 | 0.084 | 0.158 | 0.314 | 0.100 |
| <i>Crr</i> | 18767 | 1.518 | 0.394 | 0.857 | 1.221 | 1.728 | 3.736 | 1.215 |
| <i>Roc</i> | 18767 | 0.089 | -0.228 | 0.013 | 0.080 | 0.176 | 0.492 | 0.272 |
| <i>Inv</i> | 18767 | 0.170 | 0.007 | 0.067 | 0.134 | 0.222 | 0.498 | 0.149 |
| <i>Audit_lag</i> | 18767 | 4.720 | 3.689 | 4.331 | 4.585 | 4.762 | 5.889 | 0.706 |
| <i>Loss</i> | 18767 | 0.123 | 0 | 0 | 0 | 0 | 1 | 0.328 |
| <i>Soe</i> | 18767 | 0.647 | 0 | 0 | 1 | 1 | 1 | 0.478 |
| <i>Big4</i> | 18767 | 0.058 | 0 | 0 | 0 | 0 | 1 | 0.233 |
| <i>OP</i> | 18767 | 0.922 | 0 | 1 | 1 | 1 | 1 | 0.268 |

Panel B:单变量差异性检验

| <i>Variable</i> | <i>PU = 1</i> | | <i>PU = 0</i> | | <i>T</i> 值 | <i>Z</i> 值 |
|-------------------|---------------|---------------|---------------|---------------|------------|------------|
| | <i>Mean</i> | <i>Median</i> | <i>Mean</i> | <i>Median</i> | | |
| <i>Experience</i> | 1.034 | 1 | 0.987 | 1 | 3.270*** | 3.465*** |

注:标注显著性水平 * $p < 0.1$, ** $p < 0.05$, *** $p < 0.01$,其中 *T* 值为均值差异性检验,*Z* 值为中位数差异性检验。

由 Panel B 可知,相对于省委书记未变更组,变更组的审计师经验均值(1.034)显著高于未变更组的审计师经验均值(0.987),并且分别在 5% 和 1% 水平显著。这说明省委书记更替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了企业风险,事务所会提高审计质量,倾向于委派经验更丰富的审计师。

(二) 实证结果

1. 政策不确定性与审计师选择

本文采用模型(1)进行回归分析来检验政策不确定性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由表 3 的(1)、(2)可知,政策不确定性 *PU*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并在 5% 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beta = 0.040, T = 2.14$),这说明省委书记更替使企业面临经营风险,为了规避可能的审计风险,事务所会提高审计质量,委派经验更丰富的审计师。其可能的原因是官员更替带来政策的不确定性,即政策的改变和原有政企关系的重新洗牌,改变了企业行为,增加了企业经济活动的复杂性,致使审计风险增加。因而,政策不确定时,事务所会提高审计质量,倾向于委派经验更丰富的审计师。

表 3 政策不确定性与审计师选择

| | (1) 基本分析 | (2) 基本分析 | (3) <i>SOE</i> = 1 | (4) <i>SOE</i> = 0 | (5) 低市场化 | (6) 高市场化 | (7) 高盈余 | (8) 低盈余 |
|-----------------------------|--------------------|-----------------------|-----------------------|-----------------------|-----------------------|-----------------------|-----------------------|-----------------------|
| <i>PU</i> | 0.036 ** (1.96) | 0.040 ** (2.14) | 0.039 * (1.70) | 0.038 (1.20) | 0.055 * (1.95) | 0.022 (0.76) | 0.058 ** (2.25) | 0.016 (0.51) |
| <i>Size</i> | | 0.028 * (1.65) | 0.011 (0.53) | 0.065 ** (2.27) | 0.024 (1.23) | 0.032 * (1.69) | 0.028 (1.37) | 0.035 (1.62) |
| <i>Lev</i> | | -0.184 *** (-2.87) | -0.247 ** (-2.51) | -0.094 (-1.13) | -0.183 ** (-2.52) | -0.191 ** (-2.38) | -0.147 ** (-2.15) | -0.303 *** (-2.59) |
| <i>Roa</i> | | 0.092 (0.51) | -0.163 (-0.61) | 0.412 (1.63) | -0.226 (-0.97) | 0.497 ** (2.01) | 0.139 (0.70) | -0.298 (-0.79) |
| <i>Growth</i> | | -0.011 (-0.87) | -0.033 * (-1.85) | 0.011 (0.58) | -0.012 (-0.70) | -0.014 (-0.70) | -0.015 (-0.92) | -0.006 (-0.28) |
| <i>Receivable</i> | | 0.032 (0.21) | 0.066 (0.34) | -0.028 (-0.12) | 0.037 (0.20) | 0.035 (0.20) | 0.021 (0.11) | 0.273 (1.19) |
| <i>Crr</i> | | -0.033 *** (-2.68) | -0.062 *** (-3.78) | 0.012 (0.71) | -0.024 * (-1.72) | -0.043 *** (-2.86) | -0.033 ** (-2.44) | -0.038 ** (-2.11) |
| <i>Roc</i> | | -0.024 (-0.70) | -0.037 (-0.66) | 0.008 (0.18) | 0.004 (0.08) | -0.052 (-1.00) | -0.024 (-0.59) | -0.032 (-0.52) |
| <i>Inv</i> | | -0.087 (-0.69) | 0.048 (0.29) | -0.220 (-1.21) | -0.026 (-0.17) | -0.142 (-1.04) | 0.093 (0.63) | -0.317 * (-1.80) |
| <i>Audit_lag</i> | | 0.027 (0.93) | 0.011 (0.29) | 0.066 (1.47) | 0.015 (0.39) | 0.045 (1.19) | -0.025 (-0.66) | 0.088 ** (2.01) |
| <i>Loss</i> | | -0.045 (-1.16) | -0.116 ** (-2.29) | 0.069 (1.14) | -0.076 (-1.51) | -0.003 (-0.05) | -0.013 (-0.29) | -0.159 * (-1.85) |
| <i>Soe</i> | | -0.033 (-0.92) | | | -0.008 (-0.21) | -0.056 (-1.43) | -0.055 (-1.33) | -0.027 (-0.60) |
| <i>Big4</i> | | -0.548 *** (-9.77) | -0.489 *** (-7.94) | -0.721 *** (-5.14) | -0.528 *** (-8.28) | -0.569 *** (-8.55) | -0.442 *** (-6.78) | -0.666 *** (-8.51) |
| <i>OP</i> | | -0.037 (-0.76) | -0.023 (-0.36) | -0.046 (-0.65) | -0.026 (-0.44) | -0.050 (-0.82) | -0.047 (-0.91) | 0.022 (0.24) |
| <i>Year</i> | Yes | Yes | Yes | Yes | Yes | Yes | Yes | Yes |
| <i>Industry</i> | Yes | Yes | Yes | Yes | Yes | Yes | Yes | Yes |
| <i>N</i> | 18767 | 18767 | 12138 | 6629 | 9458 | 9309 | 10298 | 8469 |
| <i>Pseudo R²</i> | 0.005 | 0.010 | 0.012 | 0.014 | 0.011 | 0.013 | 0.009 | 0.017 |

注:括号内代表 *t* 值, * $p < 0.1$, ** $p < 0.05$, *** $p < 0.01$ 标注显著性水平,在公司层面进行聚类调整,下同。

2. 政策不确定性、产权性质与审计师选择

本文按照产权性质将样本分为 *SOE* 和 *N-SOE* 两组来检验产权对政策不确定性与审计师选择的影响,并采用模型 1 进行回归分析。由表 3 的(3)、(4)可知,在非国有企业样本组中($SOE = 0$),政策不确定性 *PU* 的回归系数虽然为正但不显著;在国有企业样本组中($SOE = 1$),政策不确定性 *PU* 的回归系数在 10% 水平上显著为正($\beta = 0.039, T = 1.70$),这说明事务所对国有企业在省委书记更替时委派了经验更丰富的审计师。这是因为国有企业在官员发生更替时,其领导人更可能基于新任官员的偏好而发生非正常变更^[30],致使既有的关系网络、资源被破坏,导致国有企业经营风险加剧;同时,在地方官员更替、新任官员上任时,作为国有企业最终控制人的政府更可能基于追求政治目的的目的,将诸如财政收入、税收、就业等目标强制摊派给国有企业,从而增加了国有企业的政治成本,为了应对可能的审计风险,事务所会提高审计质量,委派经验更丰富的审计师。

3. 政策不确定性、市场化进程与审计师选择

本文将样本分为低市场化和高市场化进程两组来检验市场化进程对政策不确定性与审计师选择的影响,并采用模型 1 进行回归分析。由表 3 的(5)、(6)可知,在市场化进程高的样本中,政策不确定性 *PU* 的回归系数虽然为正但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在市场化进程低的样本中,政策不确定性 *PU*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市场化能够减少政府的干预,进而缓解省委书记更替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弱化官员更替对企业经营风险的影响;在低市场化进程的地区,政府的行政干预增强了对企业的控制力,官员发生更替时,企业的风险增加,为了应对可能的审计风险,事务所会提高审计质量,委派经验更丰富的审计师。

4. 政策不确定性、盈余操纵与审计师选择

本文按照盈余管理程度高低将样本分为两组来检验企业盈余操纵对政策不确定性与审计师选择的影响,并采用模型 1 进行回归分析。由表 3 的(7)、(8)可知,在高盈余操纵组中,政策不确定性 *PU* 的回归系数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beta = 0.058, T = 2.25$);在低盈余操纵组中,政策不确定性 *PU* 的回归系数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事务所对高盈余操纵企业在省委书记更替时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更为敏感。这是因为在官员更替时,高盈余操纵企业通过盈余操纵粉饰企业业绩,以期吸引新任官员在政治升迁、资源获取等方面获取优势,这类企业的审计风险较高,为了应对可能的审计风险,事务所会提高审计质量,委派经验更丰富的审计师。

(三) 拓展性分析

1. 政府控制层级的影响

由上述分析可知,在省委书记发生更替时,事务所更倾向于向国有企业委派经验更丰富的审计师。由于政府控制层面的差异,使地方政府对不同控制层级的国有企业影响力和控制力不同。为了检验不同政府控制层级下官员更替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我们按照政府控制层级进行回归分析。表 4 结果显示,相对于中央控股和市级控股国有企业,事务所对省级控股国有企业在省委书记更替时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更为敏感。这是因为,

一方面,相对于中央控股和市级控股国有企业,省级控股国有企业领导人一般由省级党委组织部门任命和考核,在省委书记更替时,省级控股国有企业领导人更可能变更,使企业原有的关系网络被破坏;另一方面,相对于其他两类国有企业,政府官员对省级控股国有企业的控制力更强,这类企业的政治成本更高。因此,在省委书记发生更替时,政策不确定性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在省级控股国有企业更显著,事务所为了应对可能的审计风险,更可能提高审计质量,委派经验丰富的审计师。

表 4 政策不确定性、政府控制层级与审计师选择

| | (1) 中央控股 | (2) 省级控股 | (3) 市级控股 |
|---------------|-----------------|-------------------|-------------------|
| <i>PU</i> | 0.018 (0.38) | 0.084** (2.30) | -0.008 (-0.21) |
| 控制变量 | Yes | Yes | Yes |
| 时间 | Yes | Yes | Yes |
| 行业 | Yes | Yes | Yes |
| <i>N</i> | 3578 | 4307 | 4253 |
| <i>Pseudo</i> | 0.022 | 0.026 | 0.013 |

2. 分指标衡量审计师经验再检验

上述分析中我们综合考虑了审计师经验的三个维度指标:是否为事务所合伙人、教育背景和自获得注册会计师证书以来的执业时间。这一结论是综合三个维度指标的结果还是每一指标都具有解释力呢?即在省委书记发生更替时,审计师的这三类指标是否存在差异呢?

为了检验这一问题,我们分别检验官员更替对这三类指标的影响。由表5的(1)、(2)、(3)可知,政策不确定性与审计师经验的替代变量:是否为合伙人、执业经验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教育背景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在省委书记更替时,事务所会提高审计质量,更可能委派拥有合伙人身份和执业经验丰富的审计师。

表5 审计师个体特征检验

| | (1) 是否合伙人 | (2) 教育背景 | (3) 执业经验 | (4) 第一顺位 | (5) 第二顺位 |
|------------------|--------------------|-------------------|--------------------|--------------------|-----------------|
| <i>PU</i> | 0.075 ** (2.01) | -0.068 (-1.28) | 0.091 ** (2.44) | 0.067 ** (2.54) | 0.019 (0.69) |
| 控制变量 | Yes | Yes | Yes | Yes | Yes |
| 时间 | Yes | Yes | Yes | Yes | Yes |
| 行业 | Yes | Yes | Yes | Yes | Yes |
| <i>N</i> | 18767 | 18767 | 18767 | 9373 | 9394 |
| <i>Pseudo R2</i> | 0.042 | 0.014 | 0.006 | 0.012 | 0.013 |

3. 考虑签字注册会计师顺序的影响

我们考虑第一顺位和第二顺位(或第三顺位)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共同影响,在官员更替时事务所对第一顺位和第二顺位(或第三顺位)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委派是否存在差异呢?基于此,我们分别检验官员更替对两类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影响。表5的(4)、(5)显示,省委书记发生更替时,事务所更可能委派经验丰富的审计师担任第一顺位签字注册会计师。这主要是因为第一顺位签字注册会计师负责审计业务的最终复核工作,事务所一般委派经验更丰富的审计师来担任此职务,以此来应对可能的审计风险。

(四) 稳健性检验

1. 审计师经验重新度量

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我们重新度量审计师经验。上文主要采用 order probit 模型,我们进一步根据审计师经验,将取值1、2、3的审计师经验重新定义为1,否则为0,采用 logit 模型重新回归分析。表6的(1)显示,政策不确定性与审计师经验的正相关性依旧显著成立,这说明我们的结论不因被解释变量度量方法不同而有所差异。

表6 稳健性检验

| | (1) <i>Logit</i> | (2) <i>PU</i> | (3) 任期 | (4) 剔除 2007年样本 | (5) 剔除2006年、 2007年样本 |
|------------------|---------------------|--------------------|-----------------------|----------------------|----------------------------|
| <i>PU</i> | 0.111 *** (2.89) | 0.038 ** (2.05) | -0.018 *** (-3.34) | 0.071 *** (3.59) | 0.046 ** (2.00) |
| 控制变量 | Yes | Yes | Yes | Yes | Yes |
| 时间 | Yes | Yes | Yes | Yes | Yes |
| 行业 | Yes | Yes | Yes | Yes | Yes |
| <i>N</i> | 18767 | 18767 | 18767 | 16749 | 14584 |
| <i>Pseudo R2</i> | 0.011 | 0.01 | 0.011 | 0.011 | 0.012 |

2. 政策不确定性 *PU* 的重新度量

本文重新衡量政策不确定性 *PU*,我们将当年省委书记更替视为政策不确定年份,重新进行回归分析。表6的(2)显示,结论依旧成立。

若审计师选择的确受到官员更替引发的政策不确定性影响,那么随着新上任官员逐渐适应地区的政策与经济环境以及地区经济政策和政企关系稳定性的不断增强,事务所也将减少委派经验丰富的审计师。如果能够发现地区距离上一次官员变更的时间与审计师选择也存在统计上的关系,那么我们的结果将更为稳健。我们采用省委书记任期作为替代变量,表6的(3)显示,随着官员任期的增加,事务所逐渐减少委派经验丰富的审计师,这说明官员更替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确实会影响审计师选择。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对新一届政府的了解加深以及政企关系趋于稳定,地方官员更替对企业

的冲击也逐渐缓解。

3. 新会计准则实施的影响

强制实施 IFRS 会加大审计师当年的审计工作量,同时审计风险也增加,事务所更可能委派经验丰富的审计师,提高审计质量^[35]。在我们的样本期间,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发布了新企业会计准则,要求企业从2007年开始实施新会计准则,为了避免新会计准则实施给审计师选择带来的影响,我们删除了2007年样本重新回归分析;同时,我们也考虑到2006年企业有可能提前实施相关项目带来的偏差,将2006年、2007年样本删除重新回归。表6的(4)、(5)显示,政策不确定性 *PU* 与审计师选择仍在1%(或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五、研究结论

本文考察了省委书记更替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风险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省委书记更替时,事务所会提高审计质量,倾向于委派经验更丰富的审计师,尤其是拥有合伙人身份和执业经验丰富的审计师。在国有企业、低市场化进程以及高盈余操纵的公司,政策不确定性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更为显著,事务所委派了经验更丰富的审计师。进一步研究发现,事务所更可能对省级国有企业委派经验丰富的审计师,尤其是第一顺位的审计师。在对审计师经验、官员更替变量进行重新度量以及控制新会计准则实施的影响后,这一结论仍成立。

本文的研究启示在于:第一,从会计师事务所的角度研究了地方政府换届(或官员更替)对事务所审计师选择行为产生的影响。以往研究大多从企业的角度研究官员更替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例如企业投资行为、慈善捐赠、盈余管理等。本文拓展了这一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帮助我们理解政治环境对审计师选择行为的影响。第二,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地方官员的更替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随着官员任期的增加而减弱,因此保持经济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我们要高度重视新官上任开始的年份,控制官员更替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官员更替打破了地区原有政策的连续性和一致性,政策不确定性风险增加了企业的经营风险,进而影响到审计师选择。因此,在遵循地方官员管理的政治原则上,应尽量保持官员任期的稳定,这对于我们完善地方官员治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 [1] Qian Y Y, Weingast B. 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re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7, 11(4): 83-92.
- [2] 周黎安. 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 *经济研究*, 2007(7): 36-50.
- [3] 宋凌云, 王贤彬, 徐现祥. 地方官员引领产业结构变动[J]. *经济学(季刊)*, 2012(1): 71-92.
- [4] 王贤彬, 徐现祥, 李郁. 地方官员更替与经济增长[J]. *经济学(季刊)*, 2009(4): 1301-1328.
- [5] 陈刚, 李树. 官员交流、任期与反腐败[J]. *世界经济*, 2012(2): 120-142.
- [6] 史卫, 杨海生. 官员交流与 FDI 区位选择——基于省际区域 FDI 的空间计量分析[J]. *社会科学战线*, 2010(11): 35-43.
- [7] Jililo B, Yook Y. Political uncertainty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 cycles[J]. *Journal of Finance*, 2012, 67(1): 45-83.
- [8] 曹春方. 政治权力转移与公司投资:中国的逻辑[J]. *管理世界*, 2013(1): 143-157.
- [9] 徐业坤, 钱先航, 李维安. 政策不确定性、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投资——来自市委书记更替的证据[J]. *管理世界*, 2013(5): 116-130.
- [10] 戴亦一, 潘越, 冯舒. 中国企业的慈善捐赠是一种“政治献金”吗?——来自市委书记更替的证据[J]. *经济研究*, 2014(2): 74-86.
- [11] 申宇, 傅立立, 赵静梅. 市委书记更替对企业寻租影响的实证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15(9): 37-52.
- [12] Chen Y, Chen D, Wang W, Zheng D. Political uncertainty and corporat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R]. Working Paper, 2016.
- [13] 李连军, 薛云奎. 中国证券市场审计师声誉溢价与审计质量的经验研究[J]. *中国会计评论*, 2007(3): 401-414.
- [14] 曾颖, 叶康涛. 股权结构、代理成本与外部审计需求[J]. *会计研究*, 2005(10): 63-70+97.
- [15] 唐跃军. 审计质量 VS. 信号显示——终极控制权、大股东治理战略与审计师选择[J]. *金融研究*, 2011(5): 139-155.
- [16] 高强, 伍利娜. 大股东资金占用与审计师选择的再检验[J]. *审计研究*, 2007(5): 84-90.
- [17] 杜兴强, 周泽将, 杜颖洁. 政治联系、审计师选择的“地缘”偏好与审计意见——基于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审计研究*,

- 2011(2): 77-86.
- [18] Guedhami O, Pittman J A, Saffar W. Auditor choice in privatized firms: Empirical evidence on the role of state and foreign owner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9, 48(1): 151-171.
- [19] Chou J, Zaiats N, Zhang B. Does auditor choice matter to foreign investors? Evidence from foreign mutual funds worldwide[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14, 46(1): 1-20.
- [20] 杜兴强, 谭雪. 董事会国际化与审计师选择: 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J]. *审计研究*, 2016(3): 98-104.
- [21] 王裕, 任杰. 独立董事的海外背景、审计师选择与审计意见[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6(4): 40-49.
- [22] 雷光勇, 李书锋, 王秀娟. 政治关联、审计师选择与公司价值[J]. *管理世界*, 2009(7): 145-155.
- [23] 潘克勤. 实际控制人政治身份、自律型治理与审计需求——基于 IPO 前民营化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审计研究*, 2010(4): 57-65.
- [24] 梁莱歆, 冯延超, 杨继伟. 实际控制人的政治身份与审计师选择——来自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1(2): 39-46.
- [25] Tu Guoqian. Controller changes and auditor changes[J]. *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12, 33(5): 45-58.
- [26] 毛丽娟, 陶蕾. 终极控制人、事务所变更与审计质量——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4(3): 50-59.
- [27] 张军, 高远. 官员任期、异地交流与经济增长——来自省级经验的证据[J]. *经济研究*, 2007(11): 91-103.
- [28] 雷光勇, 王文忠, 刘茉. 政策不确定性、股利政策调整与市场效应[J]. *会计研究*, 2015(4): 33-39.
- [29] 姜彭, 王文忠, 雷光勇. 政治冲击、不确定性与企业现金持有[J]. *南开管理评论*, 2015(4): 130-138.
- [30] 潘越, 宁博, 肖金利. 地方政治权力转移与政企关系重建——来自地方官员更替与高管变更的证据[J]. *中国工业经济*, 2015(6): 135-147.
- [31] 陈德球, 陈运森. 政策不确定性、政治成本与盈余管理——来自市委书记更替的证据[R]. 2013.
- [32] 廖义刚, 孙俊奇, 陈燕. 法律责任、审计风险与事务所客户选择——基于 1996 年—2006 年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客户风险的分析[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09(5): 34-40.
- [33] 黄新建, 张会. 地区环境、政治关联与审计师选择——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1(3): 44-52.
- [34] 张晓东. 政治成本、盈余管理及其经济后果——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证据[J]. *中国工业经济*, 2008(8): 109-119.
- [35] George E T, Ferguson C B, Spear N A. How much does IFRS cost? IFRS adoption and audit fee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3, 88(2): 429-462.

[责任编辑: 刘 茜]

Political Uncertainty and Auditor Choice: Evidence from the Provincial Official Turnover in China

BU Danlu¹, SHI Xiangyan², ZHANG Chenyu²

(1. School of Accounting,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130, China;

2.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policy uncertainty caused by the provincial official turnover on auditor choice in China. We find that, the accounting firm tends to assign more experienced auditors in the year of provincial official turnover, especially those with partner status and rich practice experience. The effects of provincial official turnover are stronger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in regions with low marketization process and in case the client firms have higher discretionary accruals. We further find that accounting firms are more likely to delegate experienced auditors to the provincial SOEs, and especially the first-ranked signed auditor.

Key Words: policy uncertainty; auditor choice; official turnover; audit risk; audit quality; audit opinion; audit fees